



小说的聚焦

论新时期三种小说形态中的人

R E N X I A O S H U O D E J U J I A O

黄伟林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小说的聚焦

论新时期三种小说形态中的人

R E N X I A O S H U O D E J U J I A O

黄伟林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小说的聚焦——论新时期三种小说形态中的人/黄伟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04-8623-7

I. ①人… II. ①黄… III. ①当代文学-小说-人物研究-中国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242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如果从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算起，中国新时期小说已经有了30年历史。30多年的中国新时期小说思潮纷呈，形态各异，众所公认的是将西方小说近300年的小说经验做了一个高度浓缩的接受，用3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300年的道路。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意识流小说、寻根小说、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晚生代小说、女性小说、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的小说、身体写作的小说一直到当下无法命名却又锐气十足的小说创作，中国新时期小说潮落潮涨、此伏彼起，呈现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千变万化的现象、如此丰富的命名，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中国新时期小说历史时，仿佛面对千头万绪，难以理出头绪。一般认为，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衔接的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1979年王蒙以《夜的眼》开始的意识流小说探索开辟了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学习的途径，而到了1985年前后，马原、徐星、刘索拉等人的小说探索则显示了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对中国的影响。这就是说，新时期中国小说界同时并存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XING TAI ZHONG DE REN

义三种小说形态以及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小说审美思维。中国新时期小说正是以这种开放的胸襟开始了对人类现代以来各种小说思想艺术成果的吸纳，也因此造就了中国新时期小说异彩纷呈的局面。

尽管出现过某些置疑和追问，如1988年前后李洁非、黄子平就因“伪现代派”这一说法展开过争论。但是，迄今为止，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时期小说进行命名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共识和惯例。并且，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个西方输入的概念名下，也成就了其权威的中国理论家或阐释者。如茅盾、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积极建设，徐迟、袁可嘉、王蒙、高行健等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执著引进，王宁、王岳川、陈晓明在20世纪9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大力推介。然而，虽然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概念早已为学界认同，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人在使用这三个概念的时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王宁就曾经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我国的一些青年作家甚至在未搞清现代主义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前就争当‘现代派’。这确实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难怪有批评家称这些作家为‘伪现代派’。”^①王宁说的是创作界，学术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些学者急于对文学现象进行命名，但他们所“命”的“名”本身就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名不副实、名实分离的现象比比皆是。

客观地说，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名”进行清晰准确的阐释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就像王宁所说：“对现实主义的任何界定或描述，似乎都难以尽如人意。这个问题不仅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引起过多

^① 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次论争，即使是在历时 2500 多年的西方文论史上，对现实主义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或描述。”^① 连现实主义这个在我国影响深远、使用普及的概念都难以界定、描述，可想而知，界定或描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 20 世纪 80 年代才进入中国的概念就更为困难。^② 毫无疑问，我既没有野心也没有能力对这三个众说纷纭的概念做出一网打尽、水落石出的解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这三个概念做出自以为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思考，则是我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教师必须面对的。

在思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个概念的时候，我发现，人们之所以不能对它们做出较为圆满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难以对这三个概念运用的范围进行明确限制。现实主义究竟是文学创作方法还是文学思潮或文学运动，或者是某个文学流派，甚至是某种美学理论，其性质归属本身就还存在问题。杨春时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一文中认为将现实主义理解为创作方法来自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③。在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的结束语中，朱光潜专门讨论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他既将现实主义视为创作方法，同时也视之为文艺流派，并且承认美学本身也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倾向。^④ 至于后现代主义，它究竟是文学现象，抑或文化现象，似乎

① 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 页。

② 尽管现代主义文学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现代主义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已经是 20 世纪 80 年代。

③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转引自《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

④ 参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 4 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60—761 页。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XING TAI ZHONG DE REN

也难有定论。当我们无法对概念的运用范围做出限制，而想进一步澄清概念的性质内涵，这显然有点缘木求鱼的意味。当然，由于这三个概念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对它们做出一番解说，都不会完全“脱靶”，都能对它们有所触及。只是这种没有准星的射击或不对焦距的摄影，总不会获得准确清晰的结果。它使我们的所有认识都显得似是而非，大而无当，无可无不可。

我认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意识形态体系是由多层次的思想理论系统组成的。有政治层次、经济层次、道德层次、法律层次、伦理层次，当然，落实到文学艺术，则是审美层次。我们可以称审美层次的意识形态为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其不同层面有其各自完整、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然而，一种意识形态的任何层次，都会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共同精神就是对人、对社会、对宇宙自然、对历史、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可以说，对人的理解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础。不同的意识形态基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在这点上，审美意识形态也不例外。那么，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同精神，也就是对人的理解，或者说是它的人学观，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有自己独特的对人的认识，有自己的人学观；二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有一套与其人学观相联系的，甚至是由其人学观派生出来的艺术表现方法或文学创作方法。简单地说，这两方面内容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

在阅读大量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文章时，我发现，人们在讨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个概念的时候，通常瞄准的是文学和社会两个范畴。一旦谈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文学，人们可以为之总结、列举出一系列性质特征，这时候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往往被作为文学思潮或创作方法对待。一旦涉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人们习惯从社会历史的变迁寻找根源，这时候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往往被作为文化现象理解。

我觉得，无论是从文学内部去分析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抑或是从社会变迁去寻找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根源，都不是理解它们的最佳途径。前者，视野过于狭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见树而不见林；后者，目标过于散漫，隔靴搔痒而不能入木三分，见林而不见树。人们似乎忘了，文学是人学。我们谈文学，不能离开人；我们讲社会，终要落实到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其仅仅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解为文学思潮或文化现象，不如将它们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的观念，关于人性、人生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而社会，正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文化空间，它既由人构建，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塑造人。抓住了人，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人就仿佛是文学与社会两个不同范畴的关节点，只有从人的角度，才能打通文学、社会这些不同范畴间的内在途径。

本书的目标正是从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在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不同的关于人的观念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文学、文化现象的不同性质和内在联系做出有一定新意、相对完整的解说，并在这个解说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新时期小说万千情状的内在根由和逻辑关联，找出其变化发展的深层规律和价值取向，更进一步获得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评价依据，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创新价值和存在问题做出评判。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XING TAI ZHONG DE REN

本书的目标同时也就确定了本书的逻辑框架。在文章的绪论部分，我在“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下重点对现代以来的人类文学也就是人道的文学形态进行必要的解说。现代文学也就是人道文学有三种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绪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性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问题，从而为正文运用相关理论阐释中国新时期小说进行理论铺垫。文章的正文部分，在上述理论的规范下，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进行阐述。现实主义小说部分，我选择了古华的《芙蓉镇》、方方的《风景》、池莉的《不谈爱情》、刘震云的《单位》、阎真的《沧浪之水》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解读；现代主义部分选择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余华的《活着》、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作为个案进行分析解读；后现代主义部分选择苏童的《妻妾成群》、虹影的《K》、东西的《不要问我》进行个案解读。在这个部分，首先是对上述作家作品进行理论定位，使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小说形态的内在差异具体化，说明这些作品分别具有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性质。对三种不同形态的小说，我重点抓住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的理性、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的心灵性、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的文化性进行分析，进而根据本书的理论设定对这些作品中的人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其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本书以文学是人学作为基本理论前提，目的是分析阐释中国新时期三种形态中的人，阐释人在中国新时期各种小说形态中的不同表现和发展演变，阐述人的不同理解造就的不同的小说形态景观。从人出发，最终又回到人，所以本书命名为《人：小说的聚焦——论中国新时期三种小说形态中的人》。

目 录

引言	(1)
绪论:三种文学形态的理论阐释	(1)
一 “文学即人学”命题的普适性	(1)
二 人道意识与现代性	(12)
三 三种文学形态的人学基础和社会经济文化基础	(25)
 第一章 中国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	(38)
一 现实主义的人	(38)
二 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	(41)
三 宏大叙事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古华《芙蓉镇》	(43)
四 新写实小说中的人	(55)
五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阎真《沧浪之水》	(77)
 第二章 中国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	(91)
一 现代主义的人	(91)
二 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	(95)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YING TAI ZHONG DE REN

三	汪曾祺《受戒》：于破戒中表现生命本真	(98)
四	阿城《棋王》：去除时代之蔽 执守人的恒常本质	(105)
五	王安忆《小鲍庄》：透视仁义文化中人的精神衰朽	(118)
六	余华《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129)
七	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对身份的现代主义追问	(140)
第三章	中国新时期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	(152)
一	后现代主义的人	(152)
二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	(156)
三	《妻妾成群》：身体觉醒与身体反抗	(162)
四	虹影《K》：身体以正面合法的姿势登堂入室	(177)
五	东西《不要问我》：人丢失了对于自我身体的确认	(185)
结语		(197)
一	人的本体未来发展的无限性	(197)
二	作为人的艺术的小说发展的无限性	(203)
参考书目		(207)
后记		(211)

绪论：

三种文学形态的理论阐释

一 “文学即人学”命题的普适性

（一）文学与人学

文学是人学。由于高尔基 1928 年曾在一次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的庆祝大会上说他毕生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① 因此，这个命题似乎成为高尔基的专利。然而，许多文学家的文学观中都包含了文学即人学的思想。比如，早在 1918 年，周作人就发表了著名的《人的文学》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明确地将“人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基本品质加以提倡，使之成为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分野。与此同时，周作人也对他的关于人的理解作了必要的说明。从他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人的理解正是欧洲 15 世纪以来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对于人的理解的认同。而这种对于人的理解，周作人明确指出就是人道主义。周作人专门对人道主

^① 参见张婷婷《中国 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四部，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 页。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XING TAI ZHONG DE REN

义作了解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①在周作人之后，胡适、郁达夫、梁实秋等人都对其命题表示了赞同。胡适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人的文学”正是“文学内容的革新”。胡适说：“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②1956年，钱谷融以高尔基的命题为论点，专门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且由于当时文化环境而受到批判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使“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得到了广泛的传播。30年后，钱谷融的学生李劫又出版了一部专著《文学是人学新论》。由此可见，尽管论者可能对人学的理解尚有差异，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已经深入人心。甚至连周扬、巴人等著名左翼文艺理论家也都曾对这个命题有所涉及。对此，孟繁华在《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专门对“人学”命题的演变作了梳理。

尽管“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人学的理解还是有所差异的。而对人学理解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人性理解的差异。比如，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发生过著名的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大体而言，梁实秋倾向于强调人性的普遍性，鲁迅则认为人性存在阶级性等种种差异性。鲁迅关于林黛玉与焦大的那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建立在人性的阶级差异性这一基本认识基础上的。

强调人性中阶级性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抽象性。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没有能力在这里说明。但联系到具体的人性问题，我以为，人性确实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演变。比

① 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1页。

②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如，人与人的冲突最初可能是个人化的、具体化的。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与人的冲突变得越来越集团化、抽象化了。具体到 20 世纪，人类有三种现代冲突是非常深刻而且影响广阔的。那就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冷战以及文明冲突。其中，阶级斗争在中国确实达到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状态。阶级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传统的伦常观念。诸如血缘亲情、夫妻爱情、朋友友情等基本的人类关系均受到挑战。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人们头脑中那种普遍、永恒甚至有点温情脉脉的人性认识是不可能没有冲击的。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阶级斗争理论超越传统道德理论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许多阶级斗争理论的信仰者是自觉地将阶级意识凌驾于伦理意识之上的。中国现代历史叛变自己阶级出身的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现代左翼诗人殷夫那首著名的诗歌《别了，哥哥》，其副标题就是“算作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阶级意识足以让诗人抛弃 20 年的亲情，亲兄弟因为站在不同的阶级阵营而不惜刀枪相见。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已经使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深入到人们的血液。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达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冷战，一道柏林墙、一条三八线、一道台湾海峡，使多少骨肉分离、家庭残缺、亲人失散。如今，种族分歧导致了多少自杀性爆炸事件，恐怖主义成为人类安全领空的浓厚阴影。的确，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比理解阶级斗争历史容易、省事得多，但这种容易与省事是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回避，对解决现实问题无济于事。人类冲突与人性既有具体的表现也有抽象的表现，文学对人性的表现既可能落实到具体经验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深入到抽象隐蔽的历史文化。所以，当我们将文学理解为人学，既不应将文学的人性认识轻易地恒定化，也不宜将文学的人性认识过分地时效性，而应该以一种历史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用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现象还原到它原来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探讨其然及其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XING TAI ZHONG DE REN

所以然。

我仍然沿用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但我对人学的理解可能与传统人学理论不尽相同。我认为文学表达的是对人性、人的情感、人生、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和发现。这里，人生、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是人性与人的情感的载体。作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人生、人的命运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再现来发现、表现甚至发明、生产人性和人的情感。文学对人性的表现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的表现材料是语言形象，它依据的是形象思维，它不仅提供对人性和人的情感的发现和认识，而且可能创造、发明乃至生产人性和人的情感。^①

文学是人学。这也许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所有文学都在写人。事实上，文学这一名称本身已经阐明了它的本质。何为文？文就是人的创造，是人对自然的改写。顺理成章，文学当然必须从人开始，以人结束。

当然，人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广阔的命题。作为人学的文学关注的人包括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系存在层面。因为人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存在，他是在多种关系状态中存在的。关系存在层面包括三种关系，即人与宇宙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以及人与自我生命。关系存在主要展示人的空间存在。相对而言，在思考人的关系存在这一命题时，中国传统文学是主客体融合的，所谓“和合”，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和为贵”，人与自我生命的关系是“和谐”，显示了重天下、轻个人的价值取向。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作为中国新时期最杰出的导演之一，张

^① 关于发明、生产人的情感这个说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性并非天然造就，同样可能后天形成；文学也不一定跟在已然人性后面亦步亦趋，同样可能引导人性或创造新的人性。人是文化传播的动物，某种超前的文学可能会引导出某种新的人性。

张艺谋导演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批在国际上影响甚大的电影。但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对张艺谋电影的批评之声。其中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张艺谋的电影往往只是提供了风俗但没有表达思想。似乎是为了纠正这种说法，张艺谋在《英雄》上映之前反复表示这是一部有思想的影片。确实，当观众看完《英雄》，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部武侠影片，《英雄》确实不仅提供了中国武侠文化的视觉奇观，同时也表现了张艺谋对中国武侠文化本质精神的理解。这就是《英雄》所隆重推出的“天下”观念。这种“天下观”显然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天下轻个人的文化传统，是与“和为贵”的文化观念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当张艺谋试图表达他对中国武侠文化的自以为颇有新意的理解时，他仍然落入了中国人老生常谈的常识观念的窠臼。其实，在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中持“和为贵”这个观念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只是张艺谋对这一观念的具体阐释有违现代精神，他指引的实现“和为贵”的途径是以个人牺牲为前提的，这显然与现代以来形成的个人本位的观念相抵触。《英雄》之后，张艺谋还在桂林阳朔导演了一台史无前例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这台旅游演出所表达的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由此可见就是像张艺谋这样的大导演，当他试图表达他的思想时，仍然明显地有一种回到传统的惯性，或者说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势能的牵引。张艺谋本身也有向传统致敬的说法。显然，中国传统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安慰人的，是社会本位的。当我们想到了天下，个人的苦难就不算什么了。当我们感受到了天人合一，我们的心情就安静了。相反，西方文学则是个人本位的，在思考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存在这一命题时，更倾向于表现人在永恒的宇宙自然面前所做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是悲剧性的，是无望的，如西绪福斯神话。而在思考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存在时，也往往重个人、轻社会国家。面对人

REN

XIAO SHUO DE JU JIAO

——LUN XIN SHI QI SAN ZHONG XIAO SHUO XING TAI ZHONG DE REN

与自我生命的关系存在，更倾向于揭示生命本身的悲剧意识，或与社会国家不相协调的人性因素。西方文学的一个很高的境界是让人直面人生。这就是所谓悲剧精神。将人生中很残酷的一面揭露出来，告诉你这就是真实。它存心就是让你不安、焦虑、烦恼的。使你对你的存在产生疑问，使你意识到你的不幸。还有一种文学状态是展示生命本身，生命好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这种文学以打开盒子为目的。它揭开了遮蔽生命的种种屏障，敞开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的生命状态，“这是我们吗？”面对它我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惑。在这里，生命的常态消失了，呈现的是非常态，甚至变态、病态。显然，西方传统文学并不打算承担安慰人的功能，它是使人清醒、震惊、奋斗、抗争的。当然，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安慰人，还是西方传统文学的震惊人，两者的共通之处仍然是对人的关系存在的关怀。所以，当我们在强调“和为贵”的传统时，不能以个人牺牲为前提；同样，当我们在强调个性张扬的现代理念时，也不能以社会动乱为代价。

第二个层面是人生命运。这是人的时间存在。也可以说是人的时间载体。文学，特别是叙述文学主要呈现的就是人的时间存在。如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将人描述为上午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的动物，上午、中午、晚上的说法就是用一天来形容人的时间存在。当然，人的时间存在也可以被一年的四季加以形容或直接表现为人的童年、青年、中年、晚年所贯穿的整个一生。相对而言，中国文学的时间意识倾向于循环，像《三国演义》的兴亡循环，《红楼梦》的人事循环。人事的循环与天道的循环契合，从而使人心获得平静。西方文学的时间意识是发展的。表现在文学中，人的性格、精神也处于一个发展变异的状态。既然处于变化状态，就有乐观与悲观两种可能性。所以，西方文学的内在气质